

# 说说西夏瓷器的落款

宁夏 李进兴

東方收藏



图1 西夏文的落款瓷器（图片来源于《灵武窑发掘报告》）



图2 梵文“昊”字的落款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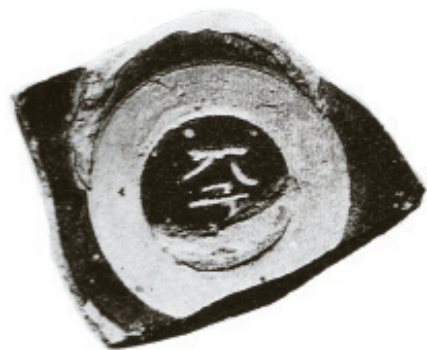


图4 汉文“李”字款的西夏瓷器



图6 汉文“李五”字款的西夏瓷器



图7 汉文“唐”字款的西夏瓷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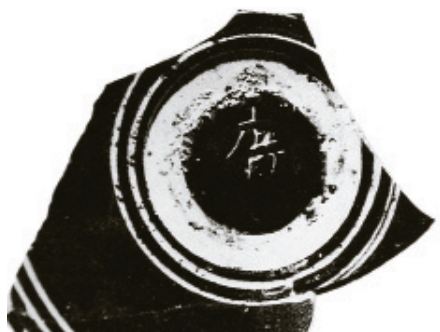


图8 汉文“唐”字款的西夏瓷器



图5 收藏界收藏的汉文“李”字款的西夏瓷器（图片来源于“收藏家网”）



很多专家认为：瓷器的落款在唐宋时期就有了，到明清时期落款已经大规模出现。但是与宋

处在一个时期的西夏王朝，却有大规模的落款出现，而且类型也比较多。在1984年发掘宁夏灵武

窑时，考古者发现了80多件带有西夏文字、梵文、汉字和图案符号的落款。在1993年武威市古城乡塔儿湾遗址的清理发掘中，多数瓷器上还墨书汉文和西夏文题记，主要为姓氏和年号等。之后在上海、宁夏的海原、西吉等县均发现了落款的西夏瓷器。

西夏瓷器上的落款有西夏文字、梵文、汉文及图案符号等；文字主要是姓氏、器物名称、容量等，可能是为官宦、名门望族定制的；图案符号可能是家族的图腾标志。

西夏文、梵文落款的西夏瓷器也很多，在灵武窑发掘时，考古专家整理出了有西夏文的瓷片。其中有一片斜壁碗的残片，在外壁墨书了比较多的西夏文（图1）；还有一个残片，宽11.8厘米，残存九个西夏文。在灵武窑址还发现一块褐釉碗（或盘）的残片，宽3.8厘米，内底刻有一梵文“昊”字（图2）。

西夏年号落款的瓷器也有，是考古专家们在发掘宁夏灵武西夏窑址时发现的，为一素烧瓷轮盘残片，上墨书有“乾祐”、“初一日立”、“未坐”，长12.6厘米（图3）。

汉文“李”字款的西夏瓷器，在西夏境内的窑址、遗址发现的比较多。在发掘宁夏灵武西夏窑址时，出土有“李”字落款的瓷器2件，一件是在碗内底刻有“李”字，其字多一笔，内底直径10厘米；另一件也是在碗内底刻有“李”字，内底直径5.5厘米（图4）。西夏瓷器爱好者考察西夏窑址时也发现一件残碗，其内底刻有“李”字（图5）。在西夏瓷器中不仅发现有“李”字款，而且还发现了“李五”两个汉字的落款（图6）。“李五”落款的西夏瓷是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宁夏灵武窑址时发现的，为一件碗底，褐釉，内底直径11.2厘米。西夏王朝（1032-1227）是以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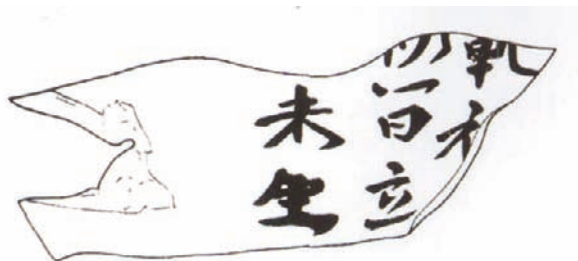


图3 西夏年号落款的瓷器



图9 西夏文“天都”款的瓷器（图片来源于《西夏瓷器》一书）



图17 褐釉瓷残片外壁上刻有“西街”、“巷张”、“张税”等汉字款



图13 “官”字款的西夏瓷片（图片来源于《东方收藏》第2期）

图14 西夏“主”字款的西夏瓷片

项族为主的帝国，自南北朝时，居青海东南部的党项族强盛起来，隋唐时始内附中原，其居地置州、府首领拓跋赤辞受唐王朝赐“李”姓。故西夏瓷器上的“李”字款与此有关。

汉文“唐”字款的西夏瓷器，是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宁夏灵武窑址时发现的，量较大，有5件之多（图7）；在发掘时还出土过一件比较完整的汉文“唐”字款的西夏瓷器（图8）。关于“唐”字可能与西夏时期党项族唐兀部有关。

在西夏时期党项族唐兀部首领朵罗台，属于以先祖名字汉化为氏。朵罗台的祖父叫唐兀·小丑，以制作弓箭著称。成吉思汗在征讨西夏国时，对于党项族制弓箭的好手给予特别的重视。在史籍《元史·朵罗台传》中记载：“太祖既定西夏，括诸色人匠，小丑（唐兀人朵罗台的祖父）以业弓进，赐名怯延兀兰，命为怯怜口行营弓匠百户，徙居和林，卒。”自公元1227年西夏国灭亡后，党项唐兀部族人随唐兀·小丑被徙居于漠北腹地哈尔和林（今蒙古国呼根汗山），后来皆融合于蒙古族。除了唐兀·小丑，他的孙子唐兀·朵罗台、唐兀·阔阔出等也从事弓箭制造业，并常把他们所造的弓献给蒙古汗，受到称赞，并封赐唐兀·朵罗台为辽阳行省蒙古部国王。

在西夏瓷器落款中，还发现有西夏文“天都”款的西夏瓷器。这件带有“天都”西夏文的瓷器，是宁夏海原县文物工作者发现的，造型为双耳瓶，釉色为茶叶末釉，高16.9厘米，口径3.2厘米，底径7.5厘米。唇口，束颈，溜肩，肩与口两侧各有一系。圆

腹，圈足。茶叶末釉，米黄胎，胎质细密。腹部刻有西夏文“天都”二字（图9），可能为瓶主人的姓氏，在李范文主编的《西夏通史》里，笔者发现有“天都金”这个人名。西夏文本《杂字》中记有叫做“弥药娑”、“贺兰金”、“天都金”、“灵州贤”的姓名，其中“弥药”是部族名，“贺兰”、“天都”为山名，“灵州”为地名。而“娑”者欢乐，“金”者宝贵，“贤”者出众，皆为吉祥语。宋夏时期，将今宁夏海原县城南十里的“南华山”、“西华山”统称“天都山”。天都山气候凉爽、景色宜人，是避暑的好地方。由此，西夏国王李元昊在此修建“天都山避暑行宫”和“南牟会行宫”。西夏大将野利遇乞当时常驻天都山，号称“天都大王”，拥有强大兵力，对北宋边境是严重威胁。

在西夏落款瓷器中，也有西夏文和汉字“圣”刻款的瓷器出土。在发掘宁夏灵武西夏窑址时就出土汉字“圣”的瓷片（图10）；西夏文“圣”字款是在宁夏西吉县三合乡出土的，为一件褐釉四系瓷扁壶，被文物工作者所征集馆藏。这件西夏文“圣”字



图11 西夏扁壶上的西夏文“圣”落款（图片来源于《大夏寻踪——西夏文物辑萃》一书）



图12 “黑砚台”落款的瓷器



款的扁壶（图11），高19厘米，腹径35厘米，底径20厘米，扁壶的边缘堆塑带状纹饰，腹部两侧正中为矮圈足，通体施褐色釉。背面圈足两侧刻有两个相同的文字，推测为西夏文“圣”字。

在发掘宁夏灵武西夏窑址时，出土有“杨”、“王”、“张”、“义”、“兴”、“院”等字款的西夏瓷器。

在宁夏灵武窑考古发掘时，出土过一件素烧瓷质的圆形砚台，砚面上刻有桃形墨池，背面刻有“黑砚台”三个汉字（图12）。由于此砚台并不是黑色的，可能是壁画家用来装不同颜料的砚台之一。

宁夏灵武回民巷瓷窑址是一处西夏早期的窑址，关于这一结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回民巷窑址时，没有发现元代的地层和瓷片，肯定地说，属于西夏早期烧制瓷器的场所。宁夏吴忠市收藏家武裕民曾在回民巷窑址上捡到一块带有“官”款的瓷器残片（图13），高10.4厘米，宽6.2厘米，上部有剥釉。“官”字书写流畅、遒劲，字迹清楚，字的右上与下部有残，对字体略有伤害。“官”字上下高3.1厘米，左右宽2.9厘米，是釉上好之后，在釉面上刻写。这一个字的字义不太好理解，是器物所有人姓氏，或工匠姓氏，也许是窑口、作坊名称，最



图16 黑釉刻西夏字小口瓶（上海博物馆征集收藏）



图15 墨书汉字“三十吊，五十吊”款的瓷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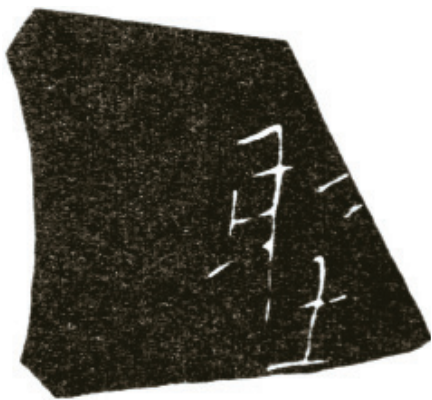


图10 汉字“圣”刻款的瓷器残片

大胆的猜测就是官府特烧。关于“官”字款的瓷器，在唐代就已经出现，辽金时期已经很鼎盛了，专家研究表明属于官窑瓷。而且在陕西、山西、东北均有发现，窑口主要是北方定窑、南方越窑和耀州窑。北方定窑的“官”款器只出现于晚唐至辽初五代的白瓷产品中；耀州窑的“官”款器只出现于五代时期黄堡窑的仿越窑青瓷产品中；南方越窑“官”字款瓷器，仅从五代和辽的两个墓葬中分别出土过一只青瓷双系罐和一只青花瓷口盘。另外，在辽朝属地松州窑（今内蒙古赤峰市缸瓦窑等窑场）出土的匣钵和垫柱上发现刻有“官”、“新官”款，但未发现刻“官”款的该窑瓷器标本。出土最多的是1985年在陕西省西安市火烧壁，一次出土了33件“官”款定窑白瓷器，件件精美无比。

宁夏海原县西夏文史研究者，在考察西夏南牟会（在今宁夏海原县西安镇）行宫遗址时，偶然发现了一块带西夏文字的瓷片。瓷片为三角形碗底，白釉，灰白胎，胎质细腻，圈足上留有支点痕

迹；西夏文字是用褐釉书写在碗的内底上。经初步考证出这块西夏文字瓷片的西夏文字为“主”字（图14）。西夏“主”字，翻阅宁夏西夏专家李范文先生所著的《夏汉字典》：“主者，主也，受主、持主、农牧主、辅主、船主、宾客、主人、正军之辅助者也。”“表示领主、领属之关系”，西夏统治者称西夏皇帝也为“国主”（详见《西夏书事》卷二十五）。不难看出，写有西夏文“主”字之款者，与宋代（今河北）定窑、辽代（内蒙古赤峰缸瓦）窑上写汉字“官”或“新官”款的意义雷同，均为官窑瓷的标记。这件西夏文“主”瓷片的发现也使西夏官窑瓷的定论有了一个“度”，有了一个标准，弥补了西夏官窑瓷定性不准的缺憾，是一件难得的珍贵的西夏瓷器文物的实物标本。

西夏标记酒、油等溶液价格、容量与瓶主人姓氏的瓷器出土和发现的也很多。考古专家们在发掘宁夏灵武西夏窑址时，就发现在青釉斜壁小碗上墨书汉字“三十吊、五十吊”，宽5.2厘米（图15）。上海博物馆征集收藏的黑釉刻西夏字小口瓶，就是一件很典型的标记容量与瓶主人姓氏的落款瓷器，该瓷器高32.6厘米，口径5.5厘米，腹径24.1厘米，底径10.9厘米。器型特点为有上下内敛小口。腹部刻有汉文草书“斗斤”二字和西夏文“廉风室”三字（图16）。

西夏瓷器落款标明店坊、作坊地址和姓名的也很多，可能是当时生产厂家发布的广告。在发现的褐釉瓷残瓷外壁上刻有“泾州”、“西街”、“巷张”、“张税”等汉字，宽14.8厘米（图17）。

总之，西夏的落款瓷器比较多，不仅有西夏文，也有梵文，还有汉字，而且在各种瓷器的各种部位都出现落款现象，非常的丰富。

（注：黑白图片均来源于《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一书）